

# 跨文化视域下马礼逊《大学》英译本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

覃柳环 冯茵紫云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摘要:** 罗伯特·马礼逊是我国古代儒学典籍英译工作的先驱者。《大学》在我国儒学思想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马氏译本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东学西传作出重要贡献。本文从跨文化的视角, 研究马礼逊《大学》英译本(1812)中的文化负载词之翻译, 分析其文化态度和翻译策略, 以及深层次的文化动因。同时, 借由儒经翻译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作用, 探索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 跨文化; 马礼逊; 《大学》英译本; 文化负载词

## 一、背景: 19世纪前儒家经典西方译介略史与《大学》翻译史

儒家经典的西译始于1581年外译的《大学》和《孟子》(岳峰, 王丽斌2019)。意大利会士殷铎泽和比利时会士柏应理、鲁日满以及奥地利会士恩理格1687年合作编辑出版了拉丁文《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 第一次在欧洲引起人们对于孔子智慧的热情, 其影响持续了近百年之久。此书中文名称为“西文四书直解”, 其实只有《大学》《中庸》《论语》, 缺少《孟子》。其中《大学》一节的译者是郭纳爵(李新德2011(01): 98-107)。这些译介作品使西方世界更加广泛地了解中国的儒家学说与历史。19世纪之后, 英国的殖民版图不断向外扩张, 汉英互译工作逐步开展, 推动了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与传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1812年,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翻译并出版《大学》英译本(袁晓亮2015(10): 43-45)。

## 二、译者: 马礼逊、《译文集》、文化态度及翻译理念概说

罗伯特·马礼逊于1807年抵达广州, 在华期间的主要活动包括学习中文、编撰汉语语言学辞书及著作。1809年, 马礼逊任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汉文翻译。1818年, 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

在翻译活动方面, 马礼逊率先把一批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翻译成了英文。其中既有以《京报》为代表的官方文件, 也有国学经典。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1812年的《中国通俗文学译文集》。

在华期间, 马礼逊从事了大量汉语言研究、汉语文献翻译等工作, 积累了翻译理念和策略的经验。《译文集》是马礼逊第一部关于中国的英文著作(孙岩2014(1): 123-126), 反映了马礼逊最初对中国文学、思想文化的见解和心得。

该译文集收录《三字经》、儒家经典《大学》《四书合讲》节录等, 都是儒学教育的必修内容, 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体系。另外两篇分别是《戒食牛肉歌》和文人书信选。这本译作涵盖范围较宽, 大致包含了中国文学、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 英文读者可以从中一窥中国文化的基础性内容(孙岩2014(1): 123-126)。

马礼逊来到中国之前, 曾研读了大量法国汉学书籍。他重视对中国文学特点的研究, 由此获得的大量汉学知识成为他认识中文的重要基石。作为多元文化理论家, 他充分肯定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价值, 主张中国应与各文明保持自然界限(钱灵杰, 操萍2017(1): 76-79)。为唤起西方读者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兴趣, 马礼逊将这种肯定付诸儒学经典的编译过程。

在《大学》英译本导言中, 马礼逊认为英译应以直译为主要手段, 以坦诚地表述原著内容为前提, 既翻译其基本观点, 又翻译其风格与形式, 实现源语文化与民族特色的真实呈现; 译文力

求遵循原文, 并尽可能避免过多注解, 以免因内容有误、过于冗杂而误导读者。因此, 马礼逊的英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异质文化观的认可。马礼逊寻求忠于原著的意象和内涵, 为西方读者呈现原生态的中国文学内容, 以展现文化的异质性, 这是马礼逊使用异化策略编译主文本的一个重要原因。

## 三、译本: 《大学》马礼逊译本及其文化负载词翻译探析举例

译者按照朱熹(2018)的体例, 把《大学》全本分成经一章和传十章。译本包括朱熹格致补传和各章节小结, 而马礼逊仅增加四条注解, 介绍了朱熹的一部分观点, 专业术语及难词则未加注疏, 对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普通英文读者来说, 理解过程有一定难度。

《大学》语汇文化特色浓郁, 中西方不同的历史、国情、社会习俗和思想观念都会给翻译工作带来困难(方美珍2011(10): 133-134)。为使译文能够准确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和审美情趣, 必须考虑到语言结构及表达方式上的特点; 同时, 还要注重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译文的通顺流畅。译者既要透彻地理解中国文化, 又要充分考虑翻译过程中达意性和可读性之间的平衡。

我们首先来看马礼逊对“三纲”的翻译。

原文: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朱熹2018)。

“大学之道”, 马氏译作“伟大的科学”。“大学”一词在中国古代有两种含义: 一是“博学”的意思; 二是指相对于基础礼节和文化知识而言的“大人之学”。“道”的本义是道路, 引申为规律、原则。在中国古代哲学和政治学里, 其内涵丰富而深刻, 是一个包含世界观、认识论、政治观、思想体系及价值体系的总括性概念。所谓“大学之道”, 指的是正心穷理、修己治人的根本原则, 并不是自然科学, 译为“科学”与原意偏差较大。

“明明德”, 马礼逊将第一个动词“明”转译为名词“阐释”。对于“明德”, 马氏译为“光辉的道德”。但是在朱熹看来, “明德”是一个涵括“心”与“性”两方面的整体性概念(王硕2012(1): 79-87)。直译与原文文化内涵相背离, “光辉的道德”所包含的人性角度的德行心性并没有呈现出来。

“亲民”, 就是“新民”, 使民自新, 马氏选用“更新”来表示“亲”, 表现出了“亲”的革新含义; “民”译为“人民”, 较为准确。

“止于至善”, 意为“处于善的最高境界”之状态, 也就是将“明明德”与“亲民”做到最完善的程度。马氏译为“如何达到善的极致”。原文仅对“至善”的标准作以说明, 马氏增译“如何”, 有解释其方法途径的含义。

从结构上看, 原文三个“在”的并列介词结构没有在译文中体现出来, 而是使用了名词、介词与从句平行的模式, 并加入解释性文字“三件事”, 与导言中所说的采取直译策略、保留原文形式有所不符。

接下来是“八目”的翻译。

“治国”“齐家”“平天下”渗透着“内圣外王”“家国同构而异质”的儒家政治观和社会观。“国”, 马氏译作“帝国”,

强调国家是一个整体；“齐家”，就是治家，使家庭成员和睦共处，“齐”具有治理之意，马氏译为“管理”，显得言简意赅。

“修身”的“修”，马氏解释为“用品德修饰”，用“修饰”这个词说明马礼逊忽视了“修”有学习的含义；“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意识，“修正”有纠正之意，表达了对个人心性的审视反思；“诚意”的“意”，本指意念，但马礼逊译为“动机”。

“格物致知”的“物”本指客观的世间万物、与“心”“理”相对的外部事物，马氏译为“事物的本质”。将“致知在格物”译为“知识的对象是事物的本质”，许是因为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补充的释义：“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至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这段注释阐明了朱熹理学关于认识论问题的观点。要格物，必须穷理。这个“理”包括道德性理和对外物的理解两个方面（郝山山 2020：14）。“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这肯定了思辨在穷理中的功能，并强调人获取知识和理解外部事物的意义，与西方认识论兴起的理论背景有差异。

文言在句式上具有简洁紧凑、强调音韵和谐的特点，较多运用排比、对偶、重复等修辞手法。马礼逊在引言中提及英译既能准确地传递原文含义，又保持了句式结构的特征。本文选择个别译句做分析。

原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朱熹 2018）。

该句中“日”与“新”的反复出现，旨在强调精神维度不断自我革新的动态过程；在音韵节奏、句式结构等方面也符合古代汉语审美标准。从对原文的功能来看，汉英翻译对重复有不同的处理。如果是为了语篇衔接，可采用代词替换、近义替换、合并和省略等形式；如果用作强调手段，为了准确达意和确保原文风格，则还需保留译文中的重复（王立弟，张立云 2002（5）：15-18）。马氏译文重复“日”与“更新”，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强调作用，但没有保留原文三字一句的句式结构，译文较冗长，信息密度降低，且失去了音韵美感，传达不出原文的语势。

#### 四、因果：马礼逊儒经翻译的文化动因与启示

《大学》对先秦儒家的伦理道德理念、原则和方法进行了充分概括与全面阐述。马礼逊深知儒家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必须在了解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理解中国人的心理特质和行为方式（钱灵杰，操萍 2016（12）：71-74）。这决定了他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襄助传教；他把体现中国人思想意识的儒家经典《大学》英译成篇，也是自己传教活动的先导。

马礼逊的一生，是动荡不安且变化极大的，因此他的文化身份也几经转变。首先，他在英国出生、长大，自然带有西式思维，并且深受教义影响。随后，开始在英国学习中文，对中国文化有一些了解，进而来到中国从事传教事业。之后在澳门和广州寻得中文老师的帮助，学习了更多中国典籍，中文水平得到提升。他也在与许多中国人的实际交往中，更了解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再之后，他担任东印度公司译员，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正是由于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其翻译及沟通工作获得双方的高度赞扬。因此，马礼逊身上体现出复杂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取舍，这种复杂性和包容性亦体现在其所译的《大学》之中。整体来看，马礼逊认为“忠实原文”非常重要，但西方文化视域中的传播形式又决定了该译本并非儒家文化的真实写照（钱灵杰，操萍 2016（12）：71-74）。来看一个反映译者翻译态度的例子：

原文：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

马氏的译文语焉不详，“知”“定”“虑”“得”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具体语境下的落脚点，都没有翻译出来；马礼逊借由直译，将这些问题推给原文，并让西方读者在自身文化背景下，理解这些表达和语句。“直译”或是“意译”，这一选择本身，就是马礼逊的文化态度之体现。在这个例子中，马礼逊尝试采用直译的方式，意在保留中华文化色彩，允许读者进行多元解读，类似于东方文化中“留白”的艺术手法，能够吸引更多西方读者品读典籍并了解中国。

从马礼逊的《大学》英译本中可以看到，文化翻译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作用是有其两面性的，既可能增进不同国家文化间的尊重和理解，也可能带来反面效应。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译者视角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译者的文化身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所选择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一味地追求直译，或一味地追求意译，都会显得片面。在真正的翻译工作中，必须适当的结合不同的翻译手法，对译文作恰当处理，才能更好地传递文化信息。

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大量的中国典籍将会借由翻译被推向世界。现在已经不只是中文译成英文，而是译成几十种不同国家的文字，在不同的国家出版。以马礼逊的《大学》译本为例，从事典籍翻译的译员，必须抓住文化翻译这个重要环节，在翻译策略选择、风格内涵把握以及文化负载词处理方式上做到求同存异，才能客观有效地传递中国文化信息，向世界展示一个完整真实的东方。

#### 五、结语

本文通过举例分析的方法，就马礼逊《大学》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做研究，主要从直译策略的使用出发，分析了马礼逊的翻译效果；结合东学西传的背景，从文化传播的视角阐释了以《大学》为例的中国典籍翻译在英语世界的影响；从文化翻译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作用出发，探索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具体路径，指出翻译典籍的工作中，需要注重文化信息的传递。

马礼逊作为英国汉学研究的先驱人物，其研究成果的价值和重要性自不待言。他的早期中国典籍译介工作，启发了后期众多西方学者对汉学典籍的学习与翻译。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较偏重对马礼逊译本的批判性解读，而行文思路中较少涉及对译本贡献和进步性的深入阐述。今后，将进一步对马氏翻译的文化动因与影响作深入研究，并扩展马氏译作的研究角度。

#### 参考文献：

- [1] 方美珍.《大学》英译版本比较[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1(10): 133-134.
- [2] 郝山山.柯大卫《大学》英译本的跨文化解读[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 14.
- [3] 李新德.耶稣会士对《四书》的翻译与阐释[J].孔子研究, 2011(01): 98-107.
- [4] 钱灵杰, 操萍.马礼逊《大学》英译的文化资本解读[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16(12): 71-74.
- [5] 钱灵杰, 操萍.马礼逊的多歧文化态度与中国典籍英译实践[J].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76-79.

基金项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资助项目《文化记忆视域下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 2021090106。

作者简介：覃柳环，女，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冯茜紫云，女，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